

□歐美漢學論著評介及提要

尚蒂伊宮漢學國際研討會簡介(上)

李 清 安

98-102

旅法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

自一九七四年九月，以法國為首的西方漢學界，大體上每隔兩年便要在巴黎北郊的尚蒂伊宮舉行漢學國際研討會。這項學術活動係由設在尚蒂伊宮的跨學科研究中心(CERIC)主持，在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協助下，由各有關漢學研究機構共同發起和組織的。與會者係法、英、美、德、荷等西方漢學界的權威學者。每次研討會的主要論文及討論情況，均編成文集出版。這些論文集可以視為對近年來西方漢學研究成果的檢閱，其中既能顯示當今漢學的水準與趨勢，也透露了存在的問題。現將每屆研討會的情形及論文集的內容，逐次介紹如下，以期引起國內外學界的關注與研究。

第一屆

——一九七四年九月廿日至廿二日——

第一屆尚蒂伊宮漢學國際研討會的主題為「十七、十八世紀北京的法國傳道會」。索爾本大學史學博士、耶穌會歷史檔案專家約瑟夫·德漢先生在開場白中首先徵引萊布尼茲的話說：「無論是為了上帝的榮光還是為了人們的普遍利益，或者為了科學與藝術的發展，也無論是對於我們和中國人，(去中國)傳道這件事都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一項事業。」由此可以見出當年歐洲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如何重視對中國的了解。歷史的發展可惜沒有按照萊布尼茲的意願使東西方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之間達成統一，但是近年的研究却至少證明了，萊布尼茲對中國文化的高度評價並沒有言過其實。第一屆漢學國際研討會的中心議題「十七、十八世紀北京的法國傳道會」，其立意自然是在於清理這一時期歐洲在中國所產生的影響，但同時也是要研究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事實上，自從李約瑟等一批漢學家的權威著作問世以來，中國人在文化領域，包括科學技術方面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已經越來越引起人們廣泛的重視。德漢先生在其文章的結尾處指出：「很明顯，在那個

時代(指十七、十八世紀)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比歐洲對中國的影響大得多。」

意味深長的是，在首屆漢學國際研討會上第一個發表學術報告的卻並不是漢學家。而且其論文題目也格外引人注目：「十八世紀中國世界對法國、英國和俄國的衝擊」。作者係法國蘭斯大學校長米歇爾·德維茲教授。他的研究領域屬於現代歷史，著有「十八世紀末葉的歐洲與世界」，大型叢書「人類的進化」中之一種，被稱為具有綜合眼光的史學家。德維茲教授認為啓蒙時代中國與歐洲之間的關係早已不是什麼學術界的稀奇事，因此今後的課題不在於去發現什麼重要的新材料，而是要全面地去認識這一歷史過程。他認為必須把這一時期中國與西歐諸國的經濟來往放到首要地位來考察，然後才可能認清文化交流的來龍去脈。在具體分析了當時茶葉、絲綢、瓷器等類商品的國際貿易情況之後，德維茲指出，是中國在通過法國與英國的渠道，源源不斷地向歐洲輸送着貨物，同時自然也就收去了金錢，甚至「新大陸提取的貴金屬有一半都這樣流向了中國」。不僅如此，在思想文化領域，也長期是由中國向歐洲「出口」。只是到了十九世紀，這種局面才有了改變。比起歐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中國容不得外來民族的佔領，而是接納和教化來訪者，只是這種接觸始終局限在一些少數的對象之間。例如中國人的造船技術原本領先於西方人，却不能利用來為自己謀利益。比較起來，中國人靠着自己的文化、經濟的實力令歐洲人折服，而西方人却只有靠着武力才能勉強左右中國人的趣味。

德維茲在其報告的結論中提到：縱覽近三百年來的現代史，總結一下中國與歐洲之間的貿易關係，一八〇〇年之前的中國，一直是輸出的多，引入的少。這種情況，在全世界範圍內，中國是唯一的一例。這就不免令人進而思索，歐洲對於中國，既然在貿易方面是「買主」，那麼，在文化方面是否也必然是「學生」？德維茲謙虛地請漢學

家們去解決這個問題。

德維茲畢竟是西方漢學界的「門外之人」，他所提出的問題儘管在我們(同樣是西方漢學的門外之人)看來具有十足的研究價值，但是却似乎未能引起漢學家們的興趣，以致幾乎無人響應。相反，著名漢學家謝和耐的報告「十六世紀末葉至十七世紀中葉的中國哲學與基督教」却在幾位資深學者中間引起熱烈的討論。謝和耐是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權威學者，對中西不同思維模式及演進軌迹有着精當的論述。他還一向十分重視明末清初之際由利瑪竇來華引發的中西思想界的接觸和前因後果。在謝和耐看來，這是中西思想的首次，並且或許也是唯一一次全面撞擊。

謝和耐指出，中國與歐洲思想史的發展是以截然不同的問題羣為基點的。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對峙始終是歐洲哲人辯論的核心，而講求「天人合一」的中國思想家，却認為這根本不是個值得辯論的問題。也正因此，當年歐洲傳教士自以為已經征服了一些中國士大夫，而實則雙方談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早期西方傳教士雖然享有第一批漢學家的聲譽，但是他們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對中國文學的無知使他們根本沒能觸及中國文明的堂奧。而中國知識分子中的開明之士如徐光啓、李之藻、王徵等人雖然翻譯介紹了諸如「歐氏幾何」等類西方科學，但充其量視其為「經世致用」之道，而並非像西方學者如笛卡兒等人那樣，把這些知識理解為人類智慧的結晶。從這個意義上說，真正的中西文化交流，要待雙方有了共同語言後才有可能進行。

在十七、十八世紀的中國與歐洲文化交流史研究中，「伏爾泰與中國」算得上一個老生常談的題目了。早在一九三二年幾乎同時出版的法人維吉爾·匹諾之「中國與法國哲學思想的形成(1640—1740)」和德人瓦爾特·恩格曼之「伏爾泰與中國」，已經對這一課題作了相當充分的處理。近年來，艾監伯爾氏的著作，更將有關資料作了深入的分析。在本屆研討會上，巴黎實用高等研究學院的教師阿爾莫加斯的報告沒有重複前人「已有定評」的工作，而只是作了一點「澄清」。他注重分析伏爾泰對中國文化之態度在不同時期的演變，指出就伏爾泰時代歐洲知識界所能獲得的有關中國的信息量而言，伏爾泰所表現的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客觀精神。這種精神時至今日仍然屬於先進之列。作者引用一位當代學者的話說：「不要總是問中國人何時開放門戶；應當首先使我們自己緊閉的心願和精神來個門戶開放」。同樣的意思由伏爾泰這位啓蒙時代的思想鬥士講出來就多了些挑戰意味：「倘若上帝想要讓中國皈依基督教，那麼，請問他是否願意將十字架丟到一邊？」應當說阿爾莫加斯通過伏爾泰的實例揭示了國際交流與跨文化傳道領域一項攸關重要的原則，即對異己文化的尊重

態度，舍此便絕對談不上最起碼的相互了解。揭示這一原則，對於克服至今危害甚重的「歐洲中心論」，可以說是有着世界意義的課題。考察中國與歐洲文化交流的歷史，有助於總結出人類不同文化交流中的經驗與教訓。問題是如何跨越漢學研究本科領域的範圍，使研究成果得到更廣泛的公衆的瞭解。從這個意義上說，過份強調漢學研究的專門性，不免會帶來「閉門造車」的弊端。

關於中國哲學對歐洲思想界的影響，研討會上尚有人就早期耶穌會士的儒家思想以及道家思想在耶穌會內的傳播發表了內容詳實的研究報告。耶穌會士來中國，儘管其目的原本是在於傳播基督教義，但實際上達到了溝通中西文化的有益作用。他們送往歐洲的大量書信，是在專門的漢學著作出現之前，歐洲文化界瞭解中國的重要渠道。因此，在很長時期內，耶穌會士對中國的認識與態度，直接左右着歐洲知識界對中國的瞭解程度與傾向。認清耶穌會士們受中國古代哲學影響的情況，將為勾畫中國哲學在歐洲傳播的概貌積累重要的歷史資料。但是，從此次研討會上學術報告的內容來看，此類研究尚有待深入。這一點，如果想到當年耶穌會士們寄往歐洲的書信可謂汗牛充棟，而且尚有許多並未公開出版，而是靠手稿傳抄，便可想見，須何等樣一項大工程，方可清理這段歷史過程。

相比之下，更具體的專題研究較能見出成效，也自然更能吸引漢學家們投身於其中。前燕京大學教授喬治·洛爾(劉樂義)關於法國耶穌會士、乾隆時期宮廷畫師王致誠及其對歐洲園林藝術之影響的報告，便顯得饒有興趣。

王致誠即讓·德尼·阿蒂雷，一七三八年來華，一七六八年死于北京。曾任內廷畫師，頗得乾隆皇帝賞識，作有名畫「凱宴圖」、「黑水解圍圖」等。劉樂義的論文並沒有去研究王致誠的繪畫，而是通過王致誠一七四九年寄往法國，並流傳於歐洲諸國的一封長信，考據興盛於十八世紀的「英國式花園」受中國園藝影響的情況。王致誠在信中曲盡其幽地描述了北京圓明園的盛況。當即在英國引起濃厚的興趣，因為剛好迎合了英國乃至全歐洲營造「英國式花園」的熱潮。早在十七世紀末葉，歐洲宮廷貴族已經對以勒諾特爾為代表的「法國式花園」感到乏味，遂興起一種追求自然訥致，注重不規則結構和細微點綴，近乎田園景色的造園風格。這股潮流實則是繼古典主義之後出現的羅可可藝術潮流在園藝藝術中的體現，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精神。而所謂「英國式花園」，在英國找不到多少可資模仿的楷模，倒是傳教士們零星介紹的中國園林，更能表達當時歐洲貴族的理想，於是，中國式的小橋流水、亭臺樓閣、假山怪石，成了「英國式花園」的典範。當時即已被稱為「中英式」。考察這番影響，王致誠的信函，以

及義大利布教會教士馬國賢帶往歐洲的「避暑山莊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時至今日，歐洲諸國仍保有不少各具特色的「中英式花園」。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對中國藝術的偏愛已是人首共知的事。有趣的是，研討會所在的尚蒂伊宮內，就有不少來自中國的藝術品，以及包括華托那樣的大藝術家模仿中國技法、描繪中國生活場景的畫幅。據雲尚蒂伊宮的主人孔戴伯爵，當年出于對中國藝術的愛好，曾不惜調用大量財力、人力，從中國運來整船整船的絲綢、瓷器等物。

中國藝術與工藝製作對歐洲的影響，尚有大量歷史素材有待整理，也肯定仍能吸引不少學者致力于斯。此後的幾屆研討會，均有人就此類課題發表報告，可謂樂此不疲。而另外有一個課題，儘管被一部份漢學家視為「禁區」，却止不住另一部份漢學家的興趣，這就是幾乎與漢學「同齡」的「禮儀之爭」。本屆研討會便有一組論文與此有關。

任何諳熟漢學史的人士都十分清楚，西方漢學是一片辯難頻仍的領域。對於中國的好惡，對於中國某件事物的贊成或者反對，把同樣是關心中國的西方人分成了兩大派，即通常表述得並不準確的「親華派」與「反華派」。此間的是非曲折，實在是一言難盡。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分野糾纏其間。而且許多糾葛的根源來自中國本土，經常是超出了學術研究的範圍。也正因此，有人說「漢學是最缺少客觀色彩的一門科學」。言外之意，中國是塊是非之地。其實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正確，因為漢學史上至少有一樁著名的公案，其根子並不在於中國，那便是「禮儀之爭」。

來自不同國度，隸屬於不同教派的歐洲傳教士，針對中國人祭祖和尊孔的習俗，分成贊成與反對者兩種態度，吵得難解難分，一直鬧到羅馬教廷。而上帝在塵世的代表偏偏沒能作到明察秋毫，宗教裁判時而聽信多明我修士的意見，明令禁止中國人的禮儀，時而又在耶穌會教士陳述之下，慨然允准中國讀書人尊師祭孔，許可中國百姓向自己的祖宗牌位叩頭禮拜。這件事，如伏爾泰所說：「比起聖馬利諾共和國在土耳其素丹和波斯帝國之間居中調停還要荒唐可笑」，自然會引得中國皇上大發雷霆之怒，結果是下令對前來傳教的洋人嚴加約束，後來乾脆禁絕了基督教。禮儀之爭雖然只是教會內部的事情，但是却嚴重影響了中西關係的發展，也自然在漢學領域內留下深深的印蹟，有着多方面的教訓值得去總結。讓·蓋諾與布魯諾·內沃的兩篇論文，為研究禮儀之爭提供了新的資料，特別是揭示了當時教派分歧背後的經濟與政治的內因，將大大有益於全面分析和理解這一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至關重要的

一環。

第二屆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六至十八日——

第二屆漢學國際研討會的主題可以說與第一屆沒有什麼大的差別：「啓蒙時代中國與歐洲的關係」。有來自十一個國家的三十二位學者參加了這次研討會。

巴黎高等研究實驗學院的米歇爾·卡基葉教授在題為「啓蒙政治的淵源」一文中，認為十七、十八世界的歐洲將中國的政治制度當作一種合乎道德的溫和君主制度的楷模，被英法等國反封建的進步力量奉為法寶，這其實是一種神話。而究其根源，則是在於利瑪竇的「中國札記」。因為利瑪竇為了說明對於中國不能像對待美洲的未開化國家那樣採取武力征討和歸化的方法，儘量替中國政府「隱惡揚善」，結果是「一幅出自保守主義眼光描述中華帝國的圖景」，成了歐洲激進分子心目中的「理想國」。有趣的是，在卡基葉報告後的討論中，謝和耐指出：對於一個外國人，利瑪竇的札記還算是比較翔實的，而且應當說是一項很大的進步。因為就當時而言，歐洲君主政體中的分權程度，的確落後於中國。另外幾位與會者也就有關封建政體、科舉制度以及其在中國和歐洲歷史上的不同意義發生了意見。由此顯示，此中尚有大量文章可作。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的愛德蒙特·雷蒂斯題為「儒家思想在十八世紀的英國」的論文，處理的大體是同一課題。作者指出：「西方社會中的不幸者經常把希望的目光移向中國。覺得那裏的一切更合乎情理，更富於人性，更令人神往。西方人試圖從中國找尋解決自身政治難題的答案。這種現象久已有之，於今猶在。特別在十七和十八世紀，歐洲人甚至以為當時中國的哲學和政體簡直就是值得仿效的楷模」。作者羅列了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思想界對中國的態度，分析了嚮往中國者與其反對派各自的理由，以為是中國人的「重義輕利」精神和「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制度令一些歐洲人嚮往。雷蒂斯認為把金錢視為人類腐化的唯一根源，這種想法未免過於天真了。

西方思想界就中國問題展開爭論，伏爾泰與孟德斯鳩這兩位著名啓蒙學者之間的論戰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子。紐約州立大學的華爾特·華特森的論文詳細羅列了兩位哲人意見相左的具體觀點，指出：僅僅證明伏爾泰是如何「親華」，孟德斯鳩是如何「反華」，這事實上說明不了什麼問題；關鍵是應認清兩位同為時代精神之體現的法國思想家，為什麼會在對待中國的看法上勢不兩立。通過此番辯析，不僅可以明白十八世紀歐洲文化界對中國的認識程度，更能從引伸的意義上說明，在不同文化相互接觸和交

流的過程中，用一種語言正確地表述另一種文化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哲學與意識形態更是在起着多麼重要的作用。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的偏愛也許有值得商榷之處，但是他畢竟說出過不少真理，比如這句話：「人類的本性到處都是一樣的，但是文化的果實却各不相同。」

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人們一向比較注重考據哪些重要人物對異己文化的態度，比如上面的例子，伏爾泰如何稱讚中國，孟德斯鳩又是怎樣批評中國。這類研究無疑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也的確通過一班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代表人物有關中國的言論，揭示了中國文化從不同價值判斷中折射出來的影像，或許可以更清楚地顯露中國文化的利弊得失。但是，幾乎還無人從公眾的角度，考察中國文化在特定時期，特定國度的傳布情況。即所謂「接受研究」。這種研究難以開展，自然是受到資料的局限。從這個意義上講，本屆研討會上的一篇論文既新穎又難能可貴，即米爾斯基夫人的「法國親華界一瞥：馮秉正所譯『通鑒綱目』認購者考」。

馮秉正原名莫里亞克·德·梅拉，法國耶穌會士，一七〇二年來華，曾與雷孝思等西方傳教士合作繪製中國地圖，頗獲康熙皇帝嘉許，一七四八年死於北京。馮秉正對漢學的最大貢獻便是將載有康熙皇帝御批的「通鑒綱目」譯成法文，並增補了一些內容，分成十三卷，自一七七七年至一七八五年在法國出版，書名為「中國通史」。這部巨著對後世法國乃至西方漢學有着深遠的影響，在當時也無疑是法國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一份「中國通史」出版之際的認購者名單有幸保存至今，使當今的人們有可能了解，究竟是哪樣一些法國和歐洲人士，在兩百年前格外熱衷地想要瞭解中國。

米爾斯基夫人在論文中寫道：從中世紀開始，中國就不斷令歐洲人神往。但是，要在進入十八世紀的啟蒙時代，歐洲對中國的興趣才發展到了頂峰，尤其在法國。「中國熱」浸透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面。而瞭解這一過程，除了查閱伏爾泰與重農學派的有關論著以外，另一個方法就是調查當時是哪一個社會階層對中國最感興趣。馮秉正所著「中國通史」的認購者名單是目前人們所能找到的僅有一份類似的檔案資料，正好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十八世紀下半葉法國「中國熱」的社會分布情況。作者逐個分析了五百三十名認購者的社會地位、職業狀況和居住地區，發現除四十三名無從查考以外，幾乎都是社會上層的顯貴人士。名副其實的貴族便有一百四十九人，而平民階層則只有一百四十人。尤以當時社會的最高等級佩劍貴族和僧侶以及「第三等級」中的上層人士，在這批讀者中佔有顯著地位。由此可見十八世紀下半葉，法國對中國最感

興趣的是政治、經濟、文化水平最高的階層。此外便是大商人和文學藝術家以及學者。從地理分佈來看，認購者在法國擁有四百七十四名，其中的絕大多數(三百二十六人)集中在巴黎。國外的三十八名認購者中，有八名其實是寓居國外的法國人，其餘三十名則分佈於當時歐洲最發達的德意志、義大利、英國和西班牙等地。

另外幾名學者非常認真的專項研究，也在本屆研討會中佔有突出地位。來自英國的葛羅維爾夫人分析了十八世紀法國耶穌會士巴多明與當年法國學界名流通信的內容，指出由於這位傳教士正直的治學精神和公允的批評態度，不僅在中西關係的低潮中仍能博得雍正皇帝的賞識，得以專志於研究中國文化，並且為法國學界輸送了關於中國科學技術的重要信息，從而出色地完成了法國國王賦予他的雙重使命：把西方科學帶給中國，將中國文明介紹到歐洲。巴黎聖德尼大學的馬爾茨洛夫考察了歐氏幾何徐光啓、梅文鼎等中國學者筆下被翻譯和解釋的過程。美國華盛頓喬治城大學的約翰·威戴克不厭其煩地考察了法國國家圖書館(即前皇家圖書館)所藏四千冊中文書籍。這些中文典籍主要是由路易十四治下的福蓋大臣於一七二二年命人從中國運至法國的。從分門別類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當年遴選這批書目時，已經對中國文化有了相當精深的認識，基本囊括了十八世紀初葉中國文化在歷史、哲學、文學、科學技術等各個領域的精華。正是這批珍貴典籍為後來兩百年法國乃至歐洲漢學事業的不斷發達準備了條件。

法國國家博物館的瑪德萊娜·雅利夫人則從另一個側面揭示了「中國熱」在歐洲的表現：工藝美術製品中模仿中國技藝和描繪中國形象的作品。由於十八世紀歐洲上流社會乃至宮廷紛紛對來自中國的器物愛不釋手，遂促使一批歐洲藝術家和手藝人着手仿製中國產品，或在自己的作品中講究中國風格或中國技法。連布歇那樣的大藝術家，也設計了不少表現中國生活場景的壁毯。造型藝術領域內的這股「中國風」不僅構成羅可可藝術重要因素，而且開了日後在歐洲不斷興旺的「東方主義」的先河。正如研討會主持人桑索里歐先生所說，研究中國藝術的影響，已經成為今後西方藝術史領域一把「新的鑰匙」。

歐洲人對中國的態度幾經演變，至使漢學家們湊到一處不免要發些感慨。權威學者謝和耐便在討論中提到：「在法國始終有一種對待中國的膚淺態度。宋君榮(十八世紀法國漢學家)在他的通訊中就表述過自己對這種膚淺態度感到痛惜。他的翻譯與著述儘管十分紮實，却一再遭到冷落，因為出版商說：讀者對此不感興趣。由於一般法國公眾喜歡娛樂，所以嚴肅著作中的艱深性便與膚淺讀者之間出現了距離。」研討會主持人桑索里歐先生也在前言中

表示：「貫通不同學科的種種研究聚在一處使我們看到：早在十八世紀，無論在北京還是在巴黎，熱衷於文化傳通的不乏其人，但是，各種文化的、語言的、社會的傳通媒介却一再延緩或者限制了真正的滙合。尤其糟糕的是，公

衆輿論總是受到種種歪曲的毒害。每當要糾正這種有害的歪曲，就會被指責為違背傳統。」但是，他還是信心十足地表示，第三屆漢學國際研討會將如期舉行。

歐美漢學論著選介

張 廣 達

102-108

瑞士日內瓦大學教授
法國巴黎華夏書院創辦人

劍橋早期內陸亞洲史

D. Sinor 主編 劍橋大學出版社 1990年 x + 518
頁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Edited by Denis Sinor,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烏拉爾——阿爾泰學名譽教授

Denis Sinor 主編的「劍橋早期內陸亞洲史」已于去年出版。全書十五章，由十一位世界各地的出色學者執筆寫成，細目如下：

- 第一章 引言：內陸亞洲 (Inner Asia) 的概念
印第安那大學 Denis Sinor
- 第二章 地理環境
印第安那大學 Robert N. Taaffe
- 第三章 歷史黎明時期的內陸亞洲
蘇聯諾沃西比爾斯克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
A. P. Okladnikov
- 第四章 斯基泰人 (the Scythians) 和薩爾瑪提人
(the Sarmatians)
蘇聯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A. I. Melyukova
- 第五章 匈奴
普林斯頓大學 余英時
- 第六章 內陸亞洲的印歐人
威斯康辛大學 A. K. Narain
- 第七章 匈 (Hun) 人時期

Denis Sinor

- 第八章 Avars 人
Szeged 大學 Samuel Szádeczky-Kardoss
- 第九章 俄羅斯森林帶的民族
Rutgers 州立大學 Peter B. Golden
- 第十章 南俄羅斯草原的民族
Peter B. Golden
- 第十一章 突厥帝國的建立和瓦解
Denis Sinor
- 第十二章 迴鶻人
澳大利亞 Griffith 大學近代亞洲研究所
Colin Mackerras
- 第十三章 哈刺汗 (黑汗) 王朝和早期伊斯蘭教
Peter B. Golden
- 第十四章 早期和中古的吐蕃
印第安那大學 Helmut Hoffman
- 第十五章 滿洲的森林民族：契丹人和女真人
慕尼黑大學 Herbert Franke

正如以上目錄所示，經過 D. Sinor 努力而編成的這部著作概括了極其遼闊地域上的許多民族的活動史。十一位撰者都是專家或權威學者，他們分別在各自擅長的領域做出了可貴的貢獻。在浩如煙海的史學著述中，全面闡明「內陸亞洲」史的書並不多見，V. V. Barthold 于世紀之交完成的「蒙古入侵時期及其之前的突厥斯坦史」以及 Skrine 和 Ross 合寫的「亞洲的腹地」迄今仍是這方面僅